

百家文库

记录古往今来世间百态
彰显中华大地万象更新

Cong BianDi Dao Fuli

从边地到腹里 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研究

张月琴 著

百家文库



本书对清代长城沿线社会变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

“从边地到腹里”，不仅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过程，而且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样貌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从边地到腹里

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研究

Cong BianDi Dao FuLi

张月琴 著

百家文库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边地到腹里：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研究/张月琴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068-7263-8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8087 号

从边地到腹里：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研究

张月琴 著

责任编辑 李 新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263-8

定 价 85.00 元

序

自2006年以来，长城沿线社会一直是我关注和考察的重点。2012年，《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堡寨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我对长城沿线地域社会研究的一个粗浅尝试。该书出版以后，我不断思考长城沿线堡寨文化与内地州县文化所呈现出不同样貌的历史根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活于长城沿线的各民族，或以激烈的战争冲突、或以互利的贸易往来、或以丰富的民间交往不时地发生着关联，是各民族共同铸就了长城沿线的历史，推进着中华民族的融合。

以往对于长城沿线的研究，主要关注某一时期内的具体事项，对长城沿线社会作综合考量的研究较为少见。本书主要以山西长城沿线地方社会为个案，从行政管理、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公共领域与精英群体、地方文教等方面，对清代长城沿线社会变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并归纳和总结了每一层面呈现出的具体特征，以突显多侧面的考察对于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清代山西长城沿线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是：从边地到腹里。在这一总体趋势之下，长城沿线的行政体制从军事化向地方化转变，并且逐步和内地州县趋于一致。随着裁卫设县的推行，军事卫所改为州县，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革。以军人为主的社会职业结构逐渐向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发展，民众生活向常态化运行。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由治军转向治民，社会精英群体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地方文教发展证明了地域社会由尚武到兴文的转变，品读文人笔下的诗文可以略见文人对于地域文化的解构和重

建，长城沿线文教发展的地域特征也蕴含在其中。这一系列的变化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长城沿线社会各个侧面在不断变化中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表现。

以清代山西长城沿线为中心，探讨长城沿线区域由“边地”向“腹里”演化的历程，阐释其中的社会变迁，剖析社会变迁过程中展现的特征，揭示其过程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并可体现对长城沿线社会的现实观照。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认知地方历史的意义。将山西长城沿线置于清代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考察，以区域社会的视角关注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可以丰富当下对于该区域历史的认知。同时，通过研究可以较为充分地发掘长城沿线社会的原真性和演化过程中不断赋予的新特性，为认知长城沿线地方社会提供较为可信的历史依据。（二）对认知地方文化的意义。在论析山西长城沿线社会由边地向腹里转变的过程中，以“边地”传统的社会向具有“腹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主线，对于认知长城沿线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现代形态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以此可知：长城沿线区域社会，在清代的发展是“边地”特质与“腹里”趋势之间的融合，既区别于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粗犷，又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细腻，而是一种逐步发展并具有边地性格的区域社会。（三）丰富社会史内容。将山西长城沿线社会纳入长城沿线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范畴中，重点观照该时期“边地”向“腹里”转变过程中展现的复杂性和区域社会的特性，是以本研究丰富了长城沿线区域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两大现实问题是：“文化重建”与“社会治理”，历史研究当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的经验和启迪。在此背景下对山西长城沿线社会进行研究正可以顺应时代的需求。该研究可以为山西长城沿线地方文化与社会建设注入一定的历史内涵，也可以提供认知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的多元化角度，为地方社会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实际的历史参照。就此而言本研究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与社会建设的当下现实意义。

本研究仅为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案例，得出的一

些认识和结论尚待进一步考究和学界的指正。关于长城沿线社会研究各个侧面的划分，或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其正确与否需要更多的研究去印证。

谨以此文献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是为序。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	1
二、研究区域和时段	2
三、研究综述	7
第一章 行政管理:从军事化到地方化	14
第一节 裁卫设县与政区调整	15
一、同朔分治	15
二、马邑入朔	20
三、直晋之纠纷	24
四、国家调适与地方诉求	27
第二节 “蒙汉分治”与晋蒙政区变化	30
一、“口外十二厅”和“一地二治”	31
二、晋绥分治:行政上的腹里之区成形	32
第三节 职官设置:从督理军政到专理民事	36
一、总督和知府	36
二、县级行政体系	45
三、衙署人员	50
第二章 社会结构:边民的常态化	53
第一节 军户、官兵及其生存状态	54
一、明末清初的军户	54
二、八旗官兵的生存状态	56

三、绿营官兵的生存状态	63
第二节 卫所、村落和社会结构	68
一、从卫所到村落	69
二、村庄的社会结构	83
三、生存环境和生计选择	94
第三节 城镇、商业和商人	101
一、中心城市:大同和右玉	101
二、县城和厅、旗城	103
三、市镇(或商品集散地)	104
四、商人及其地位	105
第三章 社会治理:从治军到治民	109
第一节 基层控制:保甲到巡警	110
第二节 乡约与地方社会	115
一、乡约的资料	115
二、资料所见乡约形象	118
三、乡约与社会秩序	121
第三节 告示与地方社会	123
一、告示的基本情况	123
二、告示与社会问题治理	125
三、告示与地方社会变迁	133
第四章 公共领域与精英群体	137
第一节 地方精英的构成	138
一、正途出身的士绅	138
二、异途出身的士绅	142
三、地方事务的参与者	144
第二节 地方精英的时空分布和生活状态	147
一、地方精英的时空分布	147

二、士绅的生活状态	153
第三节 地方精英和公共事务	156
一、地方精英的事务性活动	156
二、地方精英的工程类活动	160
三、公共事务中士绅的参与度和时代特征	162
 第五章 地方文教:从尚武到兴文	170
第一节 地方文教机构	171
一、府州县学	171
二、书院、义学和社学	176
第二节 文教机构的建设和运行	181
一、教育机构的经济运作	181
二、教育机构的管理运行	188
三、科举取士与乡试分中之例	195
第三节 文人社会的地域特征	198
一、文人社会的基本情况	198
二、文人社会的边地色彩	202
第四节 文人笔下的地域形象	206
一、边地、荒塞:清初的地方社会	206
二、“长生萍”构建的地理环境	210
三、“烈妇祠”构建的人文环境	212
 结 语	215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4

绪 论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の対象为清代山西长城沿线地方社会。

长城沿线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沿长城一带。按照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主要指西起甘肃省嘉峪关，东到辽宁省虎山，横贯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九省、市、自治区的沿长城一线的广大区域。长城沿线一直以其军事意义而著称。明代，长城的军事作用更是突出，长城沿线内侧为“边地”。入清之后，长城沿线由“边地”向“腹里”发展，其军事意义逐步弱化，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开始突显。

“边地”，指“边境地区之内或者靠近边境的地区”。《汉书·晁错传》：“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腹里”，在元代是对中书省直辖地区的通称，其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其含义相当于内地。从文字意义上讲，“边地”与“腹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地理范畴来说的。所指具体范围随中央政府的辐射范围，或者有效管辖区域的改变而改变。从更深层次的引申意义而言，“边地”一词也常用来描述未开化地区或发展程度较为缓慢、落后之地。“腹里”则意味着开化、发展相对成熟之地。故此，在本研究的语境中，“从边地到腹里”，不仅是指长城沿线历史地理的相对位置，更重要的是该区域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上的变化和发展。同时，“边地”向“腹里”转变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复杂性也是当下长城沿线区域文化和社会样貌多样性的根源。本研究以“从边地

到腹里”为中心，对清代山西长城沿线的地方社会进行历史性考察，正是基于这一点。

山西长城沿线，地处长城沿线中段，在明代为大同镇所辖范围。《三云筹俎考》称大同镇，“北扞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三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捍神京，屹然甲九塞焉”^①。弘治年间的《重修大边碑记》记载大同，“去边甚迩，昔之守臣，盖尝于九十里外筑小城，曰小边；又于百里外筑大城，曰大边。其为防边也甚固。岁久各有倾圯，继守之人虽尝修缮，然寢为风雨催剥，又被乘夜窃穿。于时修复之议虽笃，而边衅之惧，劳费之惮，迁延弗举，遂使小边仅存，而大边荡然矣！”^②从地域特征来看，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具有典型的“边地”特征：与中原相距甚远、交通不利、气候恶劣、地瘠民贫。入清之后山西长城沿线开始由“边地”向“腹里”转变。可以说，山西长城沿线社会变迁在中国长城沿线一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研究区域和时段

中国的幅员辽阔，也意味着它在气候、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方言等方面千差万别。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中国是“一个面积可能与整个欧洲相匹、具备3000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任何对中国的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和地点”^③。兹将本研究涉及的具体区域和时间介绍如下。

（一）研究区域

本研究所选的具体区域以明代大同地方为主，其实际范围包括明代大同府所辖的四州七县及山西行都司所辖诸卫所。之所以将本研究的地域范围按照明代大同的地域范围来确定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从大同地方的历史沿革说起。关于大同地方的历史沿革，各种志书中记载相差无几。只不过具体到每一州县的志书，大致是在此基础之上对本州县历史沿革的详细追述。因有文献为证，且与本研究主题关系不大，所以只列大

①（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险隘考·大同总镇图。

②（清）胡文烨：《云中郡志》，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本，1988，第514-515页。

③〔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同的历史沿革,对于其他州县暂不作解释。在此仅将志书中对于大同的历史沿革作为一种参照,来了解本研究所选区域。清代官修志书中对大同一地的历史沿革记载如下:

《禹贡》冀州之域,周并州地,战国属赵、秦雁门郡地,汉为雁门郡东部都尉。后汉末废。永嘉五年,封拓跋猗卢为代公,遂有其地。后魏天兴中徙都于此,置司州牧及代尹。延和元年,改万年尹。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改曰恒州代郡。孝昌二年,陷废。北齐天保七年,复置恒州,并置安远、临塞、威远、临阳等郡。周平齐,州郡并废。隋为马邑郡地,唐武德四年置北恒州,七年废。贞观十四年改置云州,永淳元年度。开元十八年,复置。天宝初改曰云中郡。乾元初,复曰云州,属河东道。会昌三年,置大同都团练使。四年,升为都防御使。乾符五年升为节度使。中和二年,更为雁门节度使,徙治代州。五代唐同光二年,复置大同节度使。晋天福初,割入契丹。辽重熙十三年,建为西京,升大同府。宋宣和五年,复归于宋,改曰云中府。寻入金,复为西京路大同府。元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曰大同路,属河东山西道。明洪武五年置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七年改为大同府,隶山西布政使司。本朝因之,隶山西省,领厅一、州二、县七。^①

根据以上文献的记载,“大同”首次作为本研究所选区域的地域称谓出现,应当是唐会昌三年(843)。唐会昌三年(843),以云、蔚诸州为大同道,罢属河东,置都团练使,治云州。咸通十年(869)置大同军节度使。之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云州归于契丹管辖,初仍称为大同军节度使。大同府的设置,始于辽代。《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如下: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复属冀州。周职方,正北曰并州。战国属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秦属代王国,后为平城县。魏属新兴郡。晋仍属雁门。刘琨表封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于此遂建都邑。孝文帝改为司州牧,置代尹,迁都洛邑,改万年,又置恒州。高齐文宣帝废州为安镇,今谓之东城,寻复州。周复安镇,改朔州。隋仍为镇。唐武德四年置北州,七年废。贞观十四年移云中定襄县于此。永淳元年默啜为民患,移民朔州。开元

① (清)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37-6739页。

十八年置云州。天宝元年改云中郡。乾元元年曰云州。乾符三年，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杀防御使，据州以闻。僖宗赦克用，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不受命。广明元年，李琢攻国昌，国昌兵败，与克用奔北地。黄巢入京师，诏发代北军，寻赦国昌，使讨贼。克用率三万五千骑而南，收京师，功第一，国昌封陇西郡王。国昌卒，克用取云州。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词厚礼，与太祖会于云州之东城，谋大举兵攻梁，不果。克用子存灭梁，是为唐庄宗。同光三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

敌楼、棚橹县。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门之东曰大同府，北门之西曰大同驿。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统州二、县七。^①

从上述文献来看，辽金时期大同是军事重镇，也是多民族融合和汇通之地。辽重熙十三年（1044）时，现在大同所属地域称为西京，设西京大同府。西京城，北门之东称作大同府，北门之西为大同驿。金称西京路大同府，元改大同路。明代，“（洪武）七年，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山西布政使司，置四州七县：州曰浑源、应、朔、蔚；附郭县为大同，外怀仁、山阴、马邑、广灵、灵丘、广昌”^②。随后，明王朝为了防御北方蒙古的南下，修筑长城堡寨，设置卫所。除大同府所辖十一州县外，明代大同地方还包括山西行都司所辖的大同前后卫、左卫、左川卫、大同右卫、玉林卫、阳和卫、高山卫、镇虏卫、平虏卫、威远卫、井坪千户所等卫所。在大同地方所存方志中，清代顺治《云中郡志》属于较早的一部，成书于顺治九年（1652），记载清初大同“舆图规制一如明代”^③。

清代大同府辖范围的变化，随着雍正年间大规模开始的裁卫设县展开。雍正三年（1725），“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

①（元）脱脱等撰：《辽史》，顾颉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5页。

②（清）胡文烨：《云中郡志》，大同市地方志点校注释本，1998年，第6页。

③（清）胡文烨：《云中郡志》，第8页。

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①。新成立的朔平府将原属于大同府管辖的朔州、马邑、左云、平鲁划出，并且右玉卫改为右玉县，成为附郭。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称：“山西之蔚州、与直隶之蔚县界址交错，应俱归直隶宣化府管辖，广昌县与蔚县县治村庄俱相交错，而蔚县向设广昌巡检一员，止经管广德一里，请将广德地方、归并广昌，仍隶山西大同府管辖，其巡检缺可以裁汰，至广昌守备向系宣化蔚州路管辖今应专属山西灵丘路参将管辖。”^② 雍正十年（1732），大同府下属的广昌县划归直隶之易州管辖。^③ 乾隆十五年（1750），在晋北口外设立丰镇厅，隶属大同府；设立宁远厅，隶属朔平府。嘉庆元年（1796），马邑县归入朔州。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大同府“领厅一州二县七”：丰镇厅、浑源州、应州、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怀仁县、山阴县；朔平府“领厅一州一县四”：宁远厅、朔州、左云县、右玉县、马邑县、平鲁县。至光绪八年（1882），升丰镇、宁远二厅为直隶厅，均改归归绥道管辖。可以看出清代山西长城沿线各府州县行政管辖范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民国元年（1912），废大同府治，二年（1913）原大同府属各县归属雁门道管辖。至1927年，山西长城沿线各县直接归由山西省管辖。民国时期各州县边界村落的归属也是经常变化。以大同县属范围为例，“民元以后，复将左云之云冈等村划归本县，西陲逐渐扩大，敌伪组织（1938年）将县东之龙堡等村划给阳高县，西南之秦城等村划给怀仁，面积之广狭为之一变，国土光复后仍恢复旧界”^④。

但是，行政归属的变化并不能割断区域之间的历史地理联系。李伯重认为江南之所以成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区域”，是由于该区域“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⑤。李孝聪认为区域是

①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349页。

② 《清实录》，第6893页。

③ 广昌县今属河北涞源县。

④ （民国）王谦：《大同县志》，方輿志，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手抄本。

⑤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地理空间的一种分化，“分化出来的区域一般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or 整体性”，这里的结构包括“空间结构、城乡结构、资源环境结构乃至行政结构、文化结构等”^①。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所选具体区域既要考虑实际的行政区划，也需要综合区域整体的经济因素、地理特征、历史实际以及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情况。

明代大同所辖范围，或者说是清初大同府所辖范围，与历史时期的内外长城之间的区域及地理概念上的大同盆地基本一致。而且大同、朔州在经济、文化、民众观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蔚州、广昌县划归河北，丰镇厅的设立与归属的变化，也能反映国家力量对于地方的控制，是山西长城沿线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既成事实。要想对清代山西长城沿线社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须尊重这些区域在历史上的共同渊源和发展的相似性。

所以，笔者在实际研究时注重清大同府属范围，同时关注与其在历史上具有相似情境的朔平府，并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此区域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在阐述具体问题历史时期的蔚州、广昌县、丰镇厅也适当地纳入研究视野。

本研究所选区域，与研究者惯常使用的“晋北”不同。清代所谓晋北地区，主要指太原、阳曲以北地区，包括临县、方山的一部分中北部，也称作山西北路，它由永宁州、忻州、代州、岢岚州、宁武府、大同府、朔平府及口外七厅——清水河、丰镇、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宁远组成，“七厅”现为内蒙古自治区辖地。^② 本研究所选区域和清代的晋北地区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在清代“晋北”一词涵盖面过于宽泛，且关于内蒙古地区社会研究成果较多，选择晋北作为研究区域时一些方面的论述会重复。

（二）研究时段

本研究所选时段是以清代为中心，在具体叙述时，或涉及明末，或涉及民国初年，之所以将明末、民国初年也纳入研究的叙事范围，是基于这两个时期是山西长城沿线“从边地到腹里”演变过程中不可略去的重要阶段。如此能更加明确阐述清代长城沿线由边地到腹里的社会变迁。

①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李三谋：《清代晋北农业概述》，《古今农业》，1998年第1期，第10-16页。

三、研究综述

本研究以社会史为视角,选取清代山西长城沿线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探究清代长城沿线社会变迁的轨迹和特征,将地方社会的发展放置于长城沿线整体视野中进行考察,最终勾勒出该时期山西长城沿线社会变迁全貌,并以此推动长城沿线社会史研究。由此,将该研究所涉及的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 文献综述

1. 明代文献

山西长城沿线区域的记载,主要见于各类长城典籍和边疆史地的著作之中。其中,尹耕的《两镇三关通志》^①和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②对明代大同镇的记载比较多。

尹耕的《两镇三关通志》,成书于嘉靖年间,主要以编年体的方式叙述大同镇、宣府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的军事沿革,其中重点记述嘉靖年间事迹。

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中图文并茂,详细记述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及各路城堡的形胜沿革和边情军略。书中对于山西长城沿线蒙汉和平互市时期的马市、规模、物品均有详细的记载。

山西长城沿线历来为兵家争夺之地,志书编修和留存情况均不能和内地其他郡县相比。关于明代山西长城沿线社会的记载多散见于各个版本的《山西通志》^③之中,所存府志有正德《大同府志》^④,州县的志书笔者仅见崇祯《山阴县志》^⑤,主要记述的是明代山阴县的地理沿革和历史状况,有些许文字涉及其

① (明)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嘉靖刻本,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1。

②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崇祯刻本正中书局排印本,北京:北平图书馆,1930。

③ (明)胡谧:(成化)《山西通志》,明成化十一年刻本抄本,山西大学图书馆藏。

④ (明)张钦:(正德)《大同府志》,《四库全书存目存书》,史部一八六,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⑤ (明)刘以守:《山阴县志》,《山西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他州县。

2. 清代文献

清代修志制度日趋完备，从顺治至光绪各代长城区域各省通志，各府、州、县、厅修志等，估算在数百种之多。^① 除去各朝《山西通志》中关于山西长城沿线地方社会的记载外，笔者所见综合记载该区域历史地理情况的地方志书有：顺治《云中郡志》^②、雍正《朔平府志》^③、乾隆《大同府志》^④。该时期各州县总计十六种：《大同县志》^⑤《浑源州志》^⑥《浑源州续志》^⑦《灵丘县志》^⑧《朔州志》^⑨《蔚县志》^⑩《阳高县志》^⑪《广灵县志》^⑫《广灵县补志》^⑬《蔚州志》^⑭

-
- ① 杨申茂、张玉坤等：《明长城宣府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② （清）胡文烨纂修：《云中郡志》，许殿玺、马文忠点校：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8 年点校注释本。
 - ③ （清）刘士铭修、王霭纂：《朔平府志》，李裕民点校，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年。
 - ④ （清）吴辅宏修，王飞藻、文光校订：《大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⑤ （清）黎中辅：《大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⑥ （清）张崇德纂修：《浑源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清）桂敬顺纂修：《浑源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⑦ （清）贺澍恩修、程绩纂：《浑源州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集（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⑧ （清）宋起凤原本，岳宏誉增订：《灵丘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⑨ （清）王嗣圣修，王霭纂：《朔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⑩ （清）王育楨修，李舜臣等纂：《蔚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8 年。
 - ⑪ （清）房裔兰修，苏之芬纂：《阳高县志》，民国铅印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
 - ⑫ （清）郭磊：《广灵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
 - ⑬ （清）杨亦铭：《广灵县补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
 - ⑭ （清）庆之金、杨笃等纂修：《蔚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8 年。